

当前国际恐怖活动猖獗的 科学技术维度考察*

王 震

【内容摘要】 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新一轮恐怖活动浪潮，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普及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科学技术犹如一把双刃剑。人们在享受其带来的进步和便利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些科技进步成果正在沦为恐怖分子手中的利器。本文从对当前国际恐怖活动影响最为深远的武器技术、远程交通与通信技术、网络与信息技术、新媒体技术四个层面入手，分析科技发展对国际恐怖活动的破坏程度、活动地域、人员构成、运营模式、攻击偏好、影响范围等带来的深远影响。虽然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产生国际恐怖活动的根本因素，但是由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在许多领域所产生的颠覆性后果，其对国际恐怖活动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显。当前，以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更是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加速器”和“催化剂”角色。如何有效阻止当代科技发展成为跨国恐怖活动的助力因素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 国际恐怖活动 全球反恐 科学技术 信息革命

【作者简介】 王震，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上海 邮编：200235）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8)04-0098-21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804006

* 本文为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4BGJ057）及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6ZDA096）子课题阶段性成果，特此说明并致谢。

国际恐怖活动发展事实表明，“9·11”以来的全球反恐战争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和“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初期相比，不仅国际恐怖活动的案发数量、伤亡程度大幅攀升，国际恐怖组织的袭击战术、活动范围乃至属性特征也发生了重要改变。^①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萨拉菲圣战”意识形态扩散、美国全球反恐战争失误等主观性因素，也有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际反恐机制缺陷及国际格局转型等外部环境和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而当代科技发展更是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布雷特·金（Brett King）指出：“今天，科技以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改变着我们。”^②科技发展在给人类生产和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潜在风险，增加了人类社会的脆弱性。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大规模商业应用极大地增强了国际恐怖活动的能量和威力，使跨国恐怖组织的运营模式、袭击战术、活动地域以及传播路径和影响范围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国际恐怖活动与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开始引起越来越多学者重视。早期代表性成果主要是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e）编著的《技术与恐怖主义》和图沙尔·霍什（Tushar K. Ghosh）等人主编的《恐怖主义与反恐中的科学技术》，这两部作品从科学技术视角探讨了当代科技发展与恐怖主义和国际反恐之间的联系。^③目前国内外学界有关恐怖主义与科学技术发展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新媒体与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恐怖主义以及与网络有关的恐怖主义等议题。比如，阿卜杜勒·巴里·安托万（Abdel Bari Atwan）、菲利普·赛布（Philip Seib）、达纳·詹博克（Dana M. Janbek）等人对于数字技术、社交媒体在以“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组织为代表的新一代跨国恐怖活动中的角色研究，^④约翰·皮赫特（John Pichtel）、

^① 参见王震：《9·11以来全球反恐战争困境探析》，《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第16-28页。

^② [美]布雷特·金著：《智能浪潮：增强时代来临》，刘林德、冯斌等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③ Tushar K. Ghosh, Mark A. Prelas, Dabir S. Viswanath, et 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New York and Basel: Marcel Dekker, Inc., 2002; and David Clarke, *Technology and Terrorism*, London and New Yor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4.

^④ Abdel Bari Atwan, *Islamic State: The Digital Caliphate*,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Philip Seib and Dana M. Janbek, *Global Terrorism and New Media: The Post-Al Qaeda Gene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彼得·卡托纳 (Peter Katona)、史蒂芬·莫里尔 (Stephen M. Maurer) 等人对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WMD) 的恐怖主义问题的研究,^① 特别是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查尔斯·弗格森 (Charles D. Ferguson)、布莱恩·詹金斯 (Brian M. Jenkins) 以及中国学者张沓生、李彬等人对恐怖主义问题的研究。^② 其中, 与网络和信息技术有关的恐怖主义研究则是近年来的一大热点, 且不乏优秀作品问世。^③ 此外, 还有学者就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无人机技术与国际恐怖主义、国际反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④ 本文拟从对当前国际恐怖活动影响最为深远的武器技术、远程交通与通信技术、网络与信息技术、新媒体技术入手, 分析造成当前国际恐怖活动猖獗的技术根源, 以更好地理解我们所面临的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形势。

一、武器技术发展与当代国际恐怖活动

武器技术是恐怖分子开展恐怖袭击的工具和手段, 它直接决定着恐怖活动的袭击方式、杀伤后果与社会影响。回溯恐怖主义的发展史, 我们不难看出

^① John Pictel, *Terrorism and WMDs: Awareness and Response*, Boca Raton: CRC Press, 2011; Peter Katona, John P. Sullivan, and Michael D. Intriligator, *Countering Terrorism and WMD: Creating a Global Counter-Terrorism Network*, New York and Abington: Routledge, 2006; and Stephen M. Maurer, *WMD Terrorism: Science and Policy Choice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9.

^② Graham Allison, *Nuclear Terrorism: The Ultimate Preventable Catastrophe*, New York: Hery Holt and Company, LLC, 2004; Charles D. Ferguson and William C. Potter, *The Four Faces of Nuclear Terrorism*, New York and Abington: Routledge, 2005; Brian Michael Jenkins, *Will Terrorists Go Nuclear?* New York and Amherst: Prometheus Books, 2008;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主编: 《应对核恐怖主义: 非国家行为体的核扩散与核安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

^③ 近年来在这一领域涌现了大量的论文和学术专著, 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如莱克·简泽威斯基 (Lech J. Janczewski) 等人所著的《赛博战与赛博恐怖主义》, 陈泽茂、刘吉强等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 年版; Maurice Dawson, Marwan Omar, *New Threat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Digital Crime and Cyber Terrorism*, Hershey: IGI Global, 2015; Robert L. Popp and John Yen, *Emerg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Enabling Policies for Counter-Terrorism*, New Jersey: Wiley-IEEE Press, 2006; Gabriel Weimann, *Terrorism in Cyberspace: The Next Generation*,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④ Avery Plaw, Matthew S. Fricker, and Carlos Colon, *The Drone Debate: A Primer on the U.S. Use of Unmanned Aircraft Outside Conventional Battlefields*,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5; Nicholas Grossman, *Drones and Terrorism: Asymmetric Warfare and the Threat to Global Security*, London: I.B. Tauris & Co. Ltd, 2018.

到武器技术发展对恐怖活动的深远影响。在冷兵器时代，恐怖分子只能使用匕首、刀、剑等发动袭击，其杀伤半径和杀伤效能较为有限。19世纪以前，各种刀剑利刃一直是大多数中外恐怖分子所热衷的武器。进入热兵器时代后，随着炸药、枪械等热兵器的出现，特别是半自动或自动武器、定时炸弹、高爆炸药等的出现，武器的杀伤距离和杀伤效能等得以大幅提高，恐怖分子的袭击战术也随之发生了重大改变。不过，赫伯特·蒂勒玛（Herbert K. Tillema）认为，武器技术进步和恐怖分子袭击手段的升级之间存在着一个“滞后效应”所造成的时间差，其原因就在于“恐怖分子偏好熟悉而简单的武器”。^①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老式武器容易获取、价格低廉、性能可靠，且往往便于拆解、搬运和操作；其次是武器技术作为国家安全和专政手段的重要依靠，大多被严格掌握在各国政府和军方手中，其在社会上的扩散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比如，手枪、来复枪和全自动武器出现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开始被恐怖分子所使用。1866年诺贝尔发明了炸药，并且很快将其用于军事和商业领域。然而直到20世纪初，炸药才开始成为恐怖分子频频使用的武器。其他高爆炸药，如TNT和塑性炸药等也都经历了一个类似的滞后过程。

武器技术发展对于国际恐怖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武器技术的进步和扩散极大地增强了国际恐怖活动的杀伤效能和致命程度。统计表明，1981—1986年，全球平均每起恐怖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每年分别为0.34人、0.26人、1.28人、0.55人、1.29人和0.98人，在恐怖事件中受伤的人数分别为1.64人/起、1.55人/起、2.54人/起、1.71人/起、1.91人/起、2.8人/起；2011—2016年，全球平均每起恐怖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每年分别为1.21人、1.63人、1.86人、2.57人、2.53人和2.44人，因此受伤的人数分别为2.51人/起、3.19人/起、3.45人/起、2.86人/起、3.3人/起和3.32人/起。^②从这两个不同时间段的对比可以看出，单个恐怖事件的致命程度正快

^① Herbert K. Tillema, "A Brief History of Terrorism and Technology," Tushar K. Ghosh, Mark A. Prelas, et al., e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New York and Basel: Marcel Dekker Inc., 2002, p. 23.

^② 此处数据来自美国国务院恐怖主义年度报告，除2014年、2015和2016年人均伤亡比例数据外，其余数据系作者自行统计所得。

速上升。造成上述恐怖活动伤亡程度增加的因素不外两点。一是冷战后自动或半自动小型武器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扩散，特别是美苏双方在阿富汗战场上所投放的大量小型武器与轻武器（Small Arms and Light Weapons, SALW）的扩散。由于携带方便、性能优良、使用寿命长，这些武器很快开始在一些跨国武装势力当中流转。有学者指出，在后冷战时期，“小型轻武器已经成为全球安全的一个重要威胁”。^①二是20世纪80年代后借助简易爆炸装置（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 IED）的自杀性攻击的快速扩散。利用各种爆炸物制成的简易爆炸装置如今已成为许多恐怖组织发动重大恐怖袭击的致命武器，一些媒体甚至称其为“仅次于核武器的史上最凶恶武器”^②。据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2018年发表的一份声明，过去3年内简易爆炸装置在当地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或受伤。2017年10月14日，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市区发生的一起汽车炸弹袭击中，共有500多人死亡、300人受伤。^③在伊拉克，半数以上的美军伤亡来自简易爆炸装置。这些简易爆炸装置大多采用无线电遥控起爆技术，随着美军增配了电子干扰器后，更为先进的激光遥控起爆、红外起爆和光敏起爆技术也开始出现。^④

其次，武器技术发展改变了恐怖分子的袭击手段和偏好，并推动了恐怖袭击方式及其战术的升级。硝甘炸药、硝铵炸药、明胶炸药，以及TNT、C-4和“太恩”等高爆炸药领域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恐怖袭击模式。早期恐怖分子主要使用可以进行远距离引爆的邮包炸弹。比如，1977—1983年，全球23个国家境内共发生了84起有案可查的邮包炸弹事件。著名“炸弹客”西奥多·卡钦斯基（Theodore Kaczynski）在1975—1995年间共制造了16起邮包炸弹事件，最终被判处四次终身监禁。^⑤从20世纪

^① Homayun Sidky, “War, Changing Patterns of Warfare, State Collapse, and Transnational Violence in Afghanistan: 1978-2001,” *Modern Asia Studies*, Vol. 41, No. 4, 2007, pp. 860-861.

^② 徐志伟：《土得掉渣的IED：简易爆炸装置面面观》，《坦克装甲车辆》2018年第2期，第62-67页。

^③ 王小鹏：“联合国说过去3年简易爆炸装置致3000名索马里人死伤”，新华社内罗毕2018年4月4日电。

^④ 吴桑、王亚伟：《简易爆炸装置：驻伊美军的心腹之患》，《现代军事》2006年第1期，第49-51页。

^⑤ James M. Poland,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Groups, Strategies, and Responses* (2nd Edition), Boston, New York, and London: Prentice Hall, 2011, pp 185-186.

80年代初开始,以汽车炸弹或人体炸弹为手段的自杀性攻击战术开始出现并盛行。1983年底,在不到两周时间里,自杀式汽车炸弹先后袭击了位于黎巴嫩境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法国国际维和部队营地及以色列国防军营地,造成359名美国、法国和以色列士兵丧生。汽车炸弹的巨大威力不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使众多恐怖分子竞相效尤。根据美国国务院有关报告显示,从2000年到2008年,60%以上有案可查的恐怖事件为恐怖爆炸。^①在2015年和2016年发生的全球恐怖袭击案中,爆炸袭击案件的数量也分别达到了52%和54%。^②

再次,除了常规武器技术领域的进步外,化学、生物、放射性与核(CBRN)知识的扩散使得人们对于相关威胁的担忧也与日俱增。美国蒙特雷研究院(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Monterey)的一份报告显示,1960—1999年全球共发生415次与CBRN相关的可疑事件,其中151起可以被确定为恐怖事件。美国马里兰大学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TD)的统计表明,1970—2010年全球共有219起涉及生、化和放射性物质的恐怖事件,约占恐怖事件总量的0.2%。^③虽然此类恐怖袭击总体上比较罕见,但是由于其隐蔽性强、危害性大、持续时间长、手段多样,加上民众对之缺乏了解和心理准备,因此更容易在社会上引起巨大恐慌。一些学者认为,“即使只是恐怖分子可能使用CBRN武器的潜在效应,也可能导致类似恐怖分子成功实施行动的效应。”^④

哈佛大学相关课题组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无论是偷盗一枚核武器还是通过盗取核材料制成简易核装置(Improvised Nuclear Device, IND),此类

^① U.S. Department of State, *Terrorist Bombings*,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2, p. 1.

^② National Consortium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 Responses to Terrorism, *Annex of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5*, College Park, MD, June 2016, p. 14; National Consortium for the Study of Terrorism and Responses to Terrorism, *Annex of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6*, College Park, MD, July 2017, p. 16.

^③ 刘杨钺、刘戟锋、吴承富:《武器化视角下国际生化安全态势分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第63-69页。

^④ [德]Andre Richardt, Birgit Hülseweh, Bernd Niemeyer, and Frank Sabath,《CBRN防护——化学生物放射性武器威胁的管理》,裴承新、夏治强、习海玲译,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419页。

核恐怖袭击都是最难实施的恐怖活动，但此类恐怖活动的危险是真实的。^①更重要的是，由于缺少可以报复的目标和对象，加上一些恐怖组织对死亡问题的特殊认识，造成适用于主权国家之间的核威慑与核报复政策在慑止恐怖组织使用核武器或放射性武器方面毫无意义。^②不过，也有专家认为，虽然恐怖分子引爆核装置的场景非常可怕，但“核武器在 CBRN 武器中是最难获取的”，一方面，“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谁也不会将自己的核武器交给他们完全无法控制的恐怖组织”；另一方面，作为有核国家的最高安全机密，恐怖分子偷盗核武器的成功概率比较有限。相比之下，恐怖分子通过黑市交易、偷盗等获取核材料并制造具有放射性的“脏弹”，或是针对核设施发动袭击的风险更高一些。

二、远程交通、通信技术与当代国际恐怖活动

从历史上看，恐怖活动一开始往往具有很大的地域性，其影响力也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地域范围内。这种地域性首先源于前工业时代远程交通工具的局限。依靠徒步或以马、驴、骡等畜力代步是当时最主要的交通方式，这使得人类活动范围被局限在非常有限的地域空间内，恐怖分子自然也不例外。其次是受制于当时较为落后、缓慢的信息传递技术，在现代远程通信技术出现之前，即便发生了重大恐怖事件，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广泛传播。

（一）现代远程交通技术进步对恐怖活动的影响

第一，现代交通运输领域的发展拓展了恐怖分子所能到达的地理范围和活动空间。有学者指出，“一个当代恐怖分子可以在一天之内到达目的地，完成任务后又以同样的速度返回，这只是在最近才成为可能。”^③以航空业

^① Matthew Bunn and Anthony Wier, *Securing the Bomb: An Agenda for Action*, 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 and the Project on Managing the Atom, Harvard University, May 2004, p.vii.

^②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主编：《应对核恐怖主义：非国家行为体的核扩散与核安全》，第 16 页；[德]Andre Richardt, Birgit Hülseweh, Bernd Niemeyer and Frank Sabath,《CBRN 防护——化学生物放射性和器威胁的管理》，第 420 页。

^③ Herbert K. Tillema: “A Brief Theory of Terrorism and Technology,” Tushar K. Ghosh, Mark A. Prelas, Dabir S. Viswanath, and Sudarshan K. Loyalka e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p. 24.

为例，在 20 世纪 30 年代，被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波音 237 载客不过 10 人，航程只有 700 余公里。如今的空客 A380 载客超过 500 人，航程超过 1.5 万公里。1946 年，全球空运旅客仅为 1 800 万人次，2017 年全球航空旅客已达到 40 亿人次。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 IATA）预测，2036 年全球航空客运量将达到 78 亿人次。^① 快速、便捷的交通工具在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恐怖分子实现跨国流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对当代国际恐怖组织的运营方式而言，“国际化”或“跨国化”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变化。根据《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确立的现代国际体系，任何主权国家都拥有使用武力平息国内动乱和根据军事上的必要性决定是否进行战争的垄断权。^② 然而，对于活动在其境外的恐怖分子，主权国家使用武力的权限将会受到很大限制，因为针对这些恐怖组织的武装袭击往往会被东道国视为入侵行为。这就为各种恐怖分子提供了可以免于被报复的安全庇护所，使其能够在免于被报复的情况下针对目标国发动袭击。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1990—2001 年发生的恐怖袭击中，约有 73% 是来自其他国家境内的恐怖分子。而且，由于远程交通、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恐怖分子走向国际化的成本已经大幅下降了”^③。

第二，远程交通工具的发展还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恐怖势力进行战术创新的动力，并充当了恐怖分子创新作案工具的角色。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利用汽车改装而成的汽车炸弹已经成为恐怖分子手中威力巨大的武器。2000 年 10 月，“基地”组织利用满载炸药的橡皮艇突袭正在也门亚丁港进行燃油补给的“科尔号”驱逐舰，造成 17 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死亡，38 人受伤，军舰受损严重。在 2001 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中，“基地”组织成员利用民航飞机及其携带的航空燃油为武器，使长期作为纽约地标建筑的世贸中心双子塔毁于一旦。2016 年 7 月 14 日晚，恐怖分子驾驶一辆载重量为 18

^① 奥博佳传播：《国际航协：2036 年全球航空客运量几近翻倍，增至 78 亿人次》，《空运商务》2017 年 11 期，第 29-30 页。

^②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18 页。

^③ Navin A. Bapa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errorist Campaign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24, No. 4, 2007, pp. 265-266.

吨的卡车，以“Z”字形路线冲入正在法国南部旅游城市尼斯参观国庆节烟火表演的人群，造成84人遇难，200余人受伤。类似的恐怖袭击方式近年来在欧洲较为常见，以至于简林恩·尤基（Janelynn Njuki）提出此类以“冲撞碾压和刀刺”（Ramming and Stabbing）战术为特征的恐怖活动是近代以来的第五次恐怖主义浪潮。^①

（二）远程通信技术是影响当代国际恐怖活动的又一重要领域

在电话、电报、传真、移动通信、电子邮件、手机等出现之前，人类的长途通信主要依赖于口口相传和书信往来，其传输距离、传输内容和时效都非常有限，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则带来了颠覆性变化。远程通信技术对当代国际恐怖活动的影响至少体现在四个层面。首先，现代通信技术使恐怖分子之间开展远距离沟通和大规模协调成为可能。对恐怖分子而言，如果离开现代通信技术，要想开展远距离跨境协调，不仅困难重重，还会增加被警方破获的风险。其次，现代信息技术革命为恐怖分子开展宣传、制造社会恐慌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借助发达的通信技术，可以实现通过以往口口相传或传统邮驿无法完成的工作。比如，有关恐怖活动的信息、图片、声音和影像可以在瞬间传遍全球，从而使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获得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再次，现代通信技术大大提高了恐怖组织开展协调和信息交流的速度，恐怖分子之间进行交流和协调的节奏与效能都大大加快，进而增强了其开展恐怖活动的效能。最后，远程通信技术的快速普及降低了恐怖组织开展跨国活动的成本，尤其是廉价便捷的电子邮件、移动电话和社交媒体等出现后，极大降低了恐怖分子开展协调和运营的成本。正像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说：信息革命的主要特征是信息传输费用的大幅降低，“人们花费

^①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戴维·拉波波特教授将近代历史上的恐怖主义活动划分为四次浪潮：第一次为19世纪晚期的“无政府主义”恐怖浪潮，第二次为“一战”后的“反殖民主义”恐怖浪潮，第三次为20世纪60-70年代的“新左派”恐怖主义浪潮。第四次为宗教性国际恐怖主义浪潮，它始于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至今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至于“冲撞碾压和刀刺”是否构成第五次国际恐怖主义浪潮或许值得商榷，但尤基无疑敏锐地看到了当前恐怖活动中的一些新战术特征。参见David C. Rapoport, "The Four Waves of Rebel Terror and September 11," *Anthropoetics*, Vol. 8, No.1, Spring/Summer 2002; Janelynn Njuki, "Ramming and Stabbing: The 5th Wave of Modern Terrorism?" *API Research Notes*, No. 20, August 2017.

很少的费用就可以组织起跨国非政府行为体。”^①

（三）“无人机革命”或将带来新的恐怖威胁

作为传统制造业和信息技术产业相结合的新事物，无人机技术正在推动一场军事领域的革命。根据美国国防部统计，2001年，美军只有数十架无人机，2013年，其无人机总数已经达到11000架，相关操作人员也从2005年的2100人增至目前的近万人。^②无人机在全球反恐战争中的突出表现及其在商业领域的快速普及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恐怖势力和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关注，成为全球安全领域的一大隐患。早在2014年，“伊斯兰国”就已在伊拉克费卢杰地区使用无人机。2015年4月，“伊斯兰国”发布的录像显示其正在伊拉克拜伊吉炼油厂地区使用无人机进行侦察和协调。随后不久，库尔德武装击落了一架“伊斯兰国”成员操纵的无人机。^③2018年1月6日，10余架无人机被发现试图接近俄罗斯驻叙利亚军事设施，随后被俄军方控制或击落。除此之外，因无人机“黑飞”或操作失误造成的安全事件更是不胜枚举。2014年9月，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在参加基民盟竞选活动时，一架微型无人机在其身旁坠毁。2015年初，一名男子在美国华盛顿操控一架多旋翼无人机飞行时失控，无人机最后坠入白宫，引起了不小的惊慌。^④在法国，无人机也已经带来了一系列安全隐患。比如，2014年10月，法国10余座核电站上空先后遭遇“神秘”的无人机“入侵”。2015年初，“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多次出现在巴黎上空，所到之处包括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美国驻法国大使馆等敏感区域，就连属于民用无人机“禁区”的机场也未能幸免。在伦敦，从2013年1月到2015年8月，发生了20起与无人机有关的案件，其中60%的案件涉嫌违反航空管制条例。^⑤面对无人

^① [美]小约瑟夫·奈著：《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页。

^② Avery Plaw, Matthew S. Fricker, and Carlos Colon, *The Drone Debate: A Primer on the U.S. Use of Unmanned Aircraft Outside Conventional Battlefields*, pp. 13-14.

^③ Chris Abbott, Matthew Clarke, Steve Hathorn, and Scott Hickie, *Hostile Drones: the Hostile Use of Drones by Non-State Actors Against British Targets*, Remote Control Project Oxford Research Group, January 2016, p. 11.

^④ 刘园园：《无人机飞行不能“任性”》，《科技日报》，2015年4月14日。

^⑤ Chris Abbott, Matthew Clarke, Steve Hathorn, and Scott Hickie, *Hostile Drones: the Hostile Use of Drones by Non-State Actors Against British Targets*, p. 11.

机技术被滥用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国际社会已经纷纷表达了忧虑，并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① 但是，无人机带来的挑战显然不会就此止步。

三、信息革命、计算机网络与当代国际恐怖活动

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经指出，当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历史性转变，从以农业和工业为基础的社会转向一个新的体系——后工业和信息时代，也即所谓的“第三次浪潮”。在信息技术革命影响下，一方面信息技术将会成为未来数字化战场上的主导力量，另一方面大量跨越国界的电子网络将形成新的空间关系，开辟新的冲突领域。^② 如今，这一预言早已成为现实。以计算机网络、数字传输、移动终端等为代表的信息革命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现代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1994 年之前，互联网技术尚处于起步和研发阶段，1995 年全球网民数量只有 1 600 万，不到全球人口总数的 0.4%。2015 年后，互联网技术开始进入即时化阶段，随着移动终端应用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建立在计算机网络基础上的移动终端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新活动平台。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截至 2017 年 6 月，全球互联网用户渗透率由 2016 年底的 47.1% 快速升至 48%，总数已达到 35.83 亿。另据互联网咨询公司 eMarketer 预测，2019 年全球互联网普及率将会超过 50%，届时全球将有 38.2 亿网民，占全球总人口的 50.6%。^③ 正像布雷特·金所说，“50 年之后，当我们回顾所发生的所有变化时，肯定会发现互联网就是最大的科技推动者。”^④

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大规模商业应用在给人们生活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为恐怖分子突破现实世界中的地理和物理屏障创造了条件。

^① Matthew Weaver, “UK Should Prepare for Use of Drones in Terrorist Attacks, Says Think-tank,” *The Guardian*, January 11, 2016; Sean Higgins, “FBI: Terrorists Expected to Use Aerial Drones ‘Imminently,’” *Washington Examiner*, September 27, 2017; Wim Zwijnenburg, “Terrorist Drone Attacks Are Not a Matter of ‘If’ but ‘When,’” *Newsweek*, April 29, 2016.

^② Alvin Toffler and Heidi Toffler, *War and Anti-War: Survival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3, pp. 18-25.

^③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联网发展趋势报告（2017-2018 年）》，2017 年 12 月，第 2 页。

^④ [美]布雷特·金著：《智能浪潮：增强时代来临》，第 34 页。

第一，网络与信息技术不仅深刻地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还对现存的社会治理模式和国际秩序带来了冲击，并使国际恐怖组织第一次获得了超越民族国家主权边界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在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信息是一种极易被垄断的重要资源，而信息革命造成了社会权力的快速分散。在国际层面上，它一方面使“大国的权力下降”，“小国的权力增大”；另一方面，“权力分散的组织和虚拟的共同体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而产生，它们超越领土管辖权并形成自己的管理模式”。^① 在国内层面，信息革命同样形成了对国内政治权威和社会秩序的冲击。在信息化时代，每个公民的话语权都可能会通过网络被放大，每个人都可能会通过网络空间找到自己的同情者、支持者乃至同道者。根据美国苏凡集团（Soufan Group）2017年10月发布的评估报告，从2014年6月“伊斯兰国”宣布建立“哈里发”前后到2017年底为止，已有超过110个国家的4万名“外籍战士”加入了该组织。^② 在这些“外籍战士”当中，既有来自中东地区的圣战分子，也不乏大量来自欧美国家的极端分子。显然，离开发达的现代交通和网络技术，要想在非官方层面实现如此大规模的国际动员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它打破了近代以来基于民族国家之上的传统国家间战争形态。信息技术革命赋予一些中小国家和非政府组织以更大能量，第一次使之获得了可与某些大国相抗衡的“非对称性”手段。军事科技史专家马克斯·布特（Max Boot）认为，信息革命等技术变革正在“重塑战争”^③，因为它们可以使“小国和亚国家组织获得重创强大民族国家的能力”^④。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也指出：“（在网络时代）不但战争的门槛降低了，战争与和平的界限也模糊了，因为任何网络或互联设备，从军事系统到民用设施，如能源、电网、医疗、交通管控和供水系统等，都会成为网络入侵和供给的对象。对手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与过去不同的是，你可能

^① [美]小约瑟夫·奈著：《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303-306页。

^② Richard Barrett, *Beyond the Caliphate: Foreign Fighters and the Threat of Returnees*, The Soufan Center (TSC), October 2017, p. 7.

^③ [美]马克斯·布特著：《战争改变历史：1500年以来的军事技术、战争及历史进程》，石祥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56页。

^④ 同上。

不知道受到了谁的攻击，更有甚者，你有可能根本觉察不到被袭击了。在过去，国防、军队和国家安全战略主要集中对付有限数量的传统敌对国家。但现在，难以分辨的黑客、恐怖分子、激进分子、罪犯以及其他潜在对手不计其数。”^① 换言之，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20 世纪 80 年代阿富汗战争中出现的武装冲突非国家化和战争私有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战场与后方、士兵与平民，乃至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日益模糊。由于作战主体、攻击对象、战争方式和战争目标出现了根本性变化，使得西方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② 的经典论断也正在失去意义。

表 1 互联网发展阶段特征变化

	史前阶段	第一阶段 (web1.0)	第二阶段 (web2.0)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大致时间	1994 年之前	1994—2001 年	2001—2008 年	2009—2015 年	2016 年—
阶段特征	科研阶段	商业化阶段	社会化阶段	即时化阶段	空间化阶段
突出特征	学术属性	媒体属性	社交特性	即时属性	空间属性
全球网民数临界点	0.4% (1 600 万人, 1995 年)	8.6% (5.73 亿人, 2002 年)	23.9% (15.87 亿人, 2008 年)	40% (30 亿人, 2015 年)	65% (50 亿人, 2024 年)
商业创新	邮件	门户、B2C	博客、视频、SNS	微博、微信	变革各行各业
主流形态	局域网 试验网	PC 端门户网站	PC 端社交软件	移动端应用	物联网

资料来源：鲁世宗：《网络恐怖主义的演化及治理》，《新闻知识》2016 年第 12 期，第 8 页。

第三，信息革命在人类沟通方式、社会心理及组织架构等领域所引起的变化又催生了恐怖袭击战术及其运营模式的变化。对置身于互联网中的每一

^① [德]克劳斯·施瓦布著：《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李菁译，中信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87 页。

^② [德]克劳塞维茨著：《战争论》第一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23-47 页。

位个体而言，一方面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与外部世界保持密切联系，自由获取信息并表达其诉求，另一方面网络的匿名性又使每一个体被“孤立地”置身于数字围墙之内，不需要进行面对面的社会交流。^①这一特征不仅意味着极端分子可以通过网络实现自我激进化，包括接受各种极端思想、学习各种恐怖活动技能、召唤臭味相投的同道中人等，还可以借助网络成为与国际恐怖组织毫无联系的“独狼”恐怖分子，开展“无领导”（leaderless）的跨国恐怖活动。1992年，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路易·毕姆（Louis Beam）第一次提出了“无领导抵抗”的概念。但这一概念和行为模式最初在实践中并无多大进展，直到“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才开始引起人们关注。其原因不外两点。其一，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打击下，原来许多传统的国际恐怖组织被迫化整为零，以应对全球反恐战争所带来的生存压力。其二，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移动终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为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成为近年来包括欧美西方国家在内的全球“独狼”恐怖活动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杰弗里·西蒙（Jeffrey D. Simon）甚至认为，互联网是推动当前“独狼”恐怖主义浪潮的最重要事物。它使信息的收集、处理、分配，以及人类的交流方式和社会网络构建方式等实现了革命性突破，包括“独狼”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学习武器使用、袭击战术，并获取被袭目标信息，进而成为“大玩家”。^②丹尼尔·柯亨（Daniel Cohen）更是进一步指出，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恐怖活动在传统的地理/物理空间和思想意识之外的“第三维空间”。^③

第四，计算机网络及其应用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传统上对于网络恐怖主义的定义。过去，人们对于网络恐怖主义的定义主要聚焦于其是否具有政治目标，比如美国国防部将其定义为“利用计算机和电信能力实施的犯罪行为，以造成暴力和对公共设施的毁灭或破坏来制造恐慌和社会不稳定，旨在影响

^① Jeffrey D. Simon, *Lone Wolf Terrorism: Understanding the Growing Threat*,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13, pp. 33-34.

^② Jeffrey D. Simon, *Lone Wolf Terrorism: Understanding the Growing Threat*, pp. 29-31.

^③ Daniel Cohen, “Between Imagined Reality and Real Terrorism,” *Military and Strategic Affairs*, Vol. 7, No. 3, 2015, pp. 3-17.

政府或社会，实现其特定的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目标。”^① 换言之，网络恐怖主义和黑客的主要区别仅仅在于其是否具有政治目的、是否造成恐怖效果。但是，随着恐怖分子对于网络空间的渗透和利用，这一定义已经无法涵盖更多的恐怖主义行为。基于此，国际社会日益倾向于将其定义从以网络为目标（黑客型/目标型恐怖主义）的恐怖主义进一步拓展至包括以网络为工具的恐怖主义（工具型恐怖主义）。^② 比如，联合国反恐执行工作组（Counter-Terrorism Implementation Task Force, CTITF）在 2009 年的报告中将“以恐怖主义为目的”而应用网络的犯罪类型分为四种：利用互联网远程改变计算机信息或干扰计算机之间的数据通信；为恐怖活动目的而将互联网作为信息资源使用；将互联网作为散布恐怖活动信息的手段；以互联网为工具，支持那些致力于恐怖主义活动的社团或网络。^③ 2012 年，联合国反恐工作组又将这一定义具体化为宣传（招募、煽动、激进化）；资助；训练；策划（秘密通信、公开敏感信息等）；执行；网络攻击。^④

简言之，当前国际恐怖组织对于网络及其相关技术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利用网络发动信息战。恐怖组织实施信息战的主要目的在于制造声势、扩大自身影响，获得更多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同时号召其追随者在全球范围内发起“独狼”攻击等。二是利用网络实施心理战。对于恐怖组织来说，其制造恐怖活动的目的更多是为了制造恐慌效应，使自身政治诉求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心理战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2015 年春，“伊斯兰国”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 100 多名参与反恐作战的美军士兵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住址、照片和家属信息，并煽动其在美国的追随者对上述目标发动袭击。此类做法的目的即在于震慑对手和民众，使之担心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恐怖袭击的目标。三是通过计算机网络直接发起攻击，实施网络恐

^① 莱克·简泽夫斯基等著：《赛博战与赛博恐怖主义》，第 11-14 页。

^② 鲁世宗：《网络恐怖主义的演化及治理》，《新闻知识》2016 年第 12 期，第 7-12 页；王志祥、刘婷：《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及其法律规制》，《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 年第 5 期，第 6-21 页。

^③ CTITF, *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Countering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for Terrorist Purposes*, February 2009, p. 8.

^④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and United Nations Counter-Terrorism Implementation Task Force, *The Use of the Internet for Terrorist Purposes*, Vienna and New York: 2012, pp. 3-12.

怖活动。“伊斯兰国”拥有一支专业“黑客”团队，能够利用木马程序和恶意软件攻击敌方网络系统。不过迄今为止该组织只能进行比较有限的网络攻击，比如破坏网址、篡改网页，实施阻断服务式攻击等。四是利用网络作为发展平台和活动空间，比如利用社交媒体招募新人、寻求资助、获取情报，在恐怖组织内部策划活动、开展协调、传递指令等。这些平台使恐怖分子躲开了监管部门的追捕，同时又能继续跨越国界进行各种恐怖活动。^①

四、新媒体技术与当代国际恐怖活动

媒体和恐怖主义是一对孪生兄弟。如果缺少媒体关注与报道，恐怖分子的杀戮就难以产生大面积社会恐慌，其恐怖活动也会因此而失去意义。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指出：“恐怖主义或可被视为一种专门为吸引注意而设计的暴力行为，然后通过其制造的宣传后果来传达信息。”^②他认为，早期恐怖活动主要依赖于三种渠道进行宣传和交流，即秘密地下电台；较为隐蔽的地下出版物，如报纸、海报、传单等；传统的大众媒体，如电视、广播和出版社等。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恐怖分子打破传统主流媒体的垄断提供了条件，其中影响最大的分别是互联网、廉价可靠的光盘刻录技术以及私营电视台的出现。^③

进入新世纪后，数字传输技术、可视性媒体、自媒体，以及个体化的社交媒体平台等迅速发展，更为恐怖分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活动空间和运营平台，并使之产生了与自身实力不相匹配的能量与影响力。新媒体技术发展对当前国际恐怖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利用自媒体突破传统媒体封锁，并以之作为开展宣传战和信息战的平台。新媒体技术出现以前，恐怖分子只能依赖传统媒体被动地、无意识地传播有限的信息，这些传统媒体大多掌握在官方手里，而且还往往面临各国

^① 参见王震：《“以网络打败网络”：信息化时代的反恐困境》，《世界知识》2016年第14期，第53-54页。

^② Bruce Hoffman, *Inside Terror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73-174.

^③ *Ibid.*, pp. 199-201.

安全部门的严格审查。新媒体技术出现后，国际传播领域的话语权开始分散化。国际恐怖组织能够轻易地突破传统主流媒体的限制，随心所欲地开展信息传播。“9·11”恐怖袭击事件前后，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一度成了“基地”组织对外发布信息的主要平台。“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半岛电视台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不得不减少了对“基地”组织有关信息的报道。然而，“基地”组织借助新媒体技术，通过创建其自身的新媒体平台同样可以向外界发布信息。如今，几乎所有的国际恐怖组织都设有专门的宣传部门，创建有独立的信息传播平台，如多语种网站、电子期刊、视频发布中心等，通过有选择、有计划地对外发布信息来实现其战略目标。比如，“伊斯兰国”就认为媒体是“非常有效的武器”，其影响力可以超过最具威力的原子弹，进行宣传甚至“比开展军事行动和恐怖活动还重要”。为此，该组织曾号召利用“媒体武器”，发动所谓的“媒体圣战”和“进攻性信息战”。^①

二是以社交媒体作为开展恐怖活动的重要平台，进行招募、筹资、联络、策划、宣传等活动。比如，在2015年11月13日造成129人死亡的法国巴黎恐怖袭击案件中，恐怖分子就使用了社交媒体发布信息，并利用手机APP软件进行交流与协作。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研究，“伊斯兰国”组织一度拥有46 000个推特账户，其中极度活跃的账户约为500—2 000个，每个账户每天可以发布545—2 000个帖子。这些帖子大多用阿拉伯语发送，只有约五分之一的内容使用英语。^②即便是其中一些账户被安全部门查封后，它仍可以通过“脸谱”（facebook）、“优兔”（YouTube）、“图享”（Instagram）等其他社交媒体迅速开设新的账户，利用不断更新的海量社交媒体账户躲避监管部门追踪。

三是利用新媒体平台有意或无意地宣传报道，制造强大的“示范效应”。媒体在报道恐怖事件过程中所带来的“示范效应”不仅影响深远，也极为复杂。首先，许多国际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正是通过新媒体平台提供的信息和知识实现了升级换代，大量“独狼”恐怖分子在媒体网络的帮助和激励下完

^① Charlie Winter, *Media Jihad: The Islamic State's Doctrine for Information Warfare*, London: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Radicalisation, February 2017, pp. 17-18.

^② Renee Lewis, "ISIL's Social Media Success from Core Group of Twitter Users, Study Finds," Al Jazeera, March 6, 2015.

成了“在线孵化”，接受了新的恐怖袭击战术和恐怖活动技能。^①其次，各类新媒体平台所提供的饱和信息在帮助恐怖分子增加成就感的同时，也激励了更多潜在的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进行仿效，进而投身于全球跨国“圣战运动”中去。最后，媒体在报道恐怖事件的同时，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传达出恐怖分子的政治诉求，为这些恐怖分子提供最为廉价的免费宣传，而这正是绝大多数恐怖组织梦寐以求的社会效果。这将使更多潜在的激进分子为了宣扬自身诉求，或是仅仅为了猎奇、报复和扬名去铤而走险。从近年来的全球反恐战争实践来看，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媒体对恐怖事件连篇累牍的报道都会激励一些潜在的极端分子铤而走险，采用恐怖主义战术或是直接发起恐怖袭击。这也是“9·11”事件后西方国家内部源于宗教、种族或社会仇恨的个人极端暴力事件和“独狼”恐怖袭击事件不断上升的重要原因。在发展中国家，恐怖活动“示范效应”不仅体现为个人极端暴力事件和“独狼”恐怖事件的增多，还体现在其内部社会矛盾的“恐怖主义化”和暴力冲突的“塔利班化”倾向，也即其内部反叛势力开始仿效其他国际恐怖组织，越来越多地采用“恐怖主义”袭击战术。这一点在“伊斯兰国”“博科圣地”等具有内战色彩的恐怖组织身上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在媒体如何报道恐怖主义事件问题上还存在着较大分歧（表2），部分学者倾向于为了民众安全而对媒体报道进行适当的审查和限制，另一部分学者则更为强调民众对恐怖事件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不过，在大多数学者看来，媒体在报道恐怖事件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诚如温卡特·艾伊尔（Venkat Iyer）所言，媒体对于恐怖事件的夸大报道会在民众当中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恐慌”，同时又给恐怖分子“平添了很多不应属于他们的成就感”，由此产生了两个不好的后果：或者政府在压力之下满足恐怖分子的要求；或者反应过于激烈，采取了强硬立场和镇压手段，“以至于在很长时间内对合法民众产生不良影响”。^②

^① 翟海晓、刘玉书：《“独狼”恐怖主义研究：基于犯罪特征及新媒体传播的双面视角》，《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第31-33页。

^② 温卡特·艾伊尔著：《恐怖主义与媒体：自律是解决之道吗？》，[印度]S. 温卡塔拉曼主编：《媒体与恐怖主义》，赵雪波主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9-171页。

事实上，即便是在当今一些所谓的“言论自由”国家，其主流媒体对于恐怖事件的报道也并非绝对完全自由。这种限制或是来自其媒体的自律传统，或是源于人道、人性和道义的道德文化，也可能是来自其国内法律、法规对于暴力事件传播的硬性约束。不过，在当今由新媒体技术所塑造的自媒体生态中，此类约束正在迅速失去其固有的影响力。

表 2 关于媒体审查制度与恐怖主义的争论

支持审查制度的观点	反对审查制度的看法
<p>反叛性恐怖分子会利用媒体作为平台进行政治宣传，这有助于其招募新成员。</p>	<p>如果媒体在恐怖分子的暴行面前保持沉默，公众或许会认为作恶者并没有那么坏。</p>
<p>对恐怖分子来说，知名度非常重要，有时候还是对恐怖活动的特殊奖励，而审查制度将会使恐怖活动变得不那么有效。</p>	<p>对于患有精神疾病的恐怖分子来说，公开性是一种暴力的替代；没有媒体的关注，这一威胁或许会变成事实。</p>
<p>媒体对于恐怖事件的详尽报道为潜在的恐怖分子提供了范例，这会增加其未来作案时的成功概率。</p>	<p>媒体对于政治性恐怖分子的抵制或许会促使其升级暴力，直到媒体开始报道其事迹。</p>
<p>恐怖事件过程中的信息播报对恐怖分子非常有用。</p>	<p>如果媒体不报道恐怖主义，谣言就会四处传播，这或许会导致比媒体报道更加糟糕的结果。</p>
<p>劫持人质事件中的媒体报道可能会危及人质安全。</p>	<p>在人质被劫持期间，媒体的介入可以促使警方避免采取冒险战术，减少恐怖分子和人质的不必要伤亡。</p>
<p>对恐怖事件的报道可能会导致模仿行为。</p>	<p>如果用沉默来对待恐怖主义，政府就能够将政治歧见人士的非恐怖活动或亚恐怖活动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进而导致政府行为失去约束。</p>
<p>在绑架和劫持人质事件中，媒体报道可能会造成绑架者的恐慌，进而导致其杀害人质。</p>	<p>如果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审查媒体，公众将会怀疑关于其他事件的报道是否也经过了审查，媒体的可信度就会下降。</p>
<p>像恐怖分子那样无视别人生命的人，不能仅仅因为他们使用了暴力就可以强制公众关注。</p>	<p>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压制媒体新闻将会使民众在安全问题上产生错觉，使他们在直接面对恐怖活动时因缺乏心理准备而不知所措。</p>

报道恐怖事件或许会激活民众中的一些虐待狂。	对特定恐怖活动公共意识的缺失会让民众无法全面理解政治形势。
媒体对恐怖分子的报道或会引发愤怒，进而导致针对恐怖分子所代言群体的私刑和无法控制的报复行为。	关键信息被剥夺、掩盖的感觉会让公众失去对当局的信任。
负面新闻会让民众士气低落，而“好的新闻会让我们感觉良好”。	如果媒体失去自由，反叛性恐怖分子所宣称的“民主国家并非真正自由”的观点将会被进一步强化。

资料来源：James M. Poland, *Understanding Terrorism: Groups, Strategies, and Responses* (2nd Edition), Boston, New York and London, Prentice Hall, 2011, pp. 67-68.

结论：科技发展与国际恐怖主义

国际恐怖主义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现象，其发生和发展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国际恐怖活动更趋猖獗的现象已经引起了不少媒体和学者的关注。但是，以往对于跨国恐怖活动猖獗根源的探讨大多聚焦于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和“以暴制暴”的反恐政策、“萨拉菲圣战”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扩散以及全球化造成的经济贫富分化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科学技术发展在推动跨国恐怖活动扩散和升级过程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事实上，由于当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大规模商业化应用在许多领域所产生的颠覆性后果，科学技术对国际恐怖活动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显。在武器技术领域，小型轻武器，尤其是自动、半自动武器和简易爆炸装置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扩散，以及自杀性袭击战术的传播不仅为恐怖分子提供了更多工具和选项，也提升了恐怖袭击的杀伤效能，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恐怖分子的袭击手段和偏好。在远程交通和通信技术领域，飞机、汽车、火车、轮船等现代化交通工具和电话、传真、智能手机等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恐怖分子突破地域限制，进行战术创新，开展跨国协调、宣传和动员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在计算机网络和信息技术领域，建立在计算机网络基础上的互联网和移动应用终端等不仅为恐怖分子提供了开展信息战、宣传战和心理战的平台，也成为其开展恐怖活动的第三维空

间，这种非对称的暴力对抗正在挑战以往人们对于传统战争行为的定义。在新媒体技术领域，可视性媒体技术和个性化的自媒体、社交媒体平台等不仅为恐怖分子提供了突破传统主流媒体封锁的重要手段，还为其提供了全新的活动空间和运营平台，从而形成了与其实力无法匹配的国际影响力。

诚然，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导致国际恐怖活动的根本性因素。但是，在当代国际恐怖活动快速扩张和升级过程中，科学技术却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加速器和催化剂功能。人类社会在享受科技发展带来的进步和便利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包括一些科技进步沦为恐怖分子手中的利器。就此而言，我们在欢呼无人机技术、大数据技术、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造福人类（包括被用于反恐战争）的同时，也不能不担忧这些现代高科技进步对于未来国际恐怖活动的潜在影响。尽管武器技术发展与国际恐怖活动手段升级之间存在着赫伯特·蒂勒玛（Herbert Tilema）所谓的“滞后效应”，但是这种“滞后效应”如今正在迅速减弱。一方面，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非同寻常的加速度时代”，由于世界互联程度不断增强，“新科技在广阔的市场范围中得以推广，而且推广的速度比过去最快的时候还要快很多”。^① 另一方面，在和恐怖分子进行技术赛跑的过程中，我们未必总是赢家。布鲁斯·霍夫曼早已指出，恐怖分子的成功取决于其能否“领先于当局和反恐技术的能力”，也即能否突破政府的安全防范措施。^② 因此，如何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把握当代科技发展的趋势与规律，最大限度地防止其成为当代国际恐怖组织手中的利器，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难题。

[收稿日期：2018-06-05]

[修回日期：2018-06-12]

[责任编辑：孙震海]

^① [美]布雷特·金著：《智能浪潮：增强时代来临》，第 8-9 页。

^② Bruce Hoffman, *Inside Terrorism*, pp. 252-253.